发展规划简报

第160期

华大报字（部）04号

华侨大学发展规划处 编

2016年4月11日

【高教动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机遇、挑战与前景

※首份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出炉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四成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摘要）

【专家视点】※高校建设“两个一流”应注重四个坚持

※如何优化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

【校内传真】※我校召开2016年教学工作会议暨“教学质量年”动员大会

※我校召开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项目中期检查学术交流会

【高教动态】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机遇、挑战与前景

编者按：自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我国智库发展进入新阶段。一年多时间里，各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在体制机制、运营管理、评价评估等方面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为了帮助广大智库深化认识、开阔视野，并促进各智库交流经验、共谋发展，3月27日-28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邀请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中浦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专题研讨班（第 1 期）全体学员 120 余人共同探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机遇、挑战与前景。本版特刊出会议发言精粹，以飨读者。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4 月关于智库的批示，给中国智库发展带来了春天。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在决策体系里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我们做智库工作的同志，经常说智库的基本功能是资政启民。资政，就是为决策提供新的支撑；启民，就是用新的思想来启迪百姓，用准确的政策信息，为公众提供有益的、有助于理解政府政策的环境，从而为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创造更好的公众环境。具体而言，可归纳为政策研究、政策评估、政策解读和国际交流这四个方面。当前，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如何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智库的能力建设。一是人才建设。一方面要吸纳社会上的高端人才，开门办智库、开门搞研究，对高端人才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另一方面，要和社会各界、国际国内的同行进行深度交流，用好外部人才。二是智库文化建设。党政智库应从国家、民族发展的大义出发来从事政策研究，所谓的独立研究，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持站在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角度来开展研究。三是要有一个适合自己的、高效的管理制度。四是要有与履行职责相适应的财力支持，要按照智库运行的规律建立相关财务制度。现行的许多制度和智库运行是不匹配的，特别是在党政部门，一定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真正设计一套适合智库运行的体制机制。

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去年年初，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我们深深感到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于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领会到智库建设对于国家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将智库建设提到党和政府工作日程上来适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客观要求，也适应了中国和平崛起、加速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要求。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阶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是我们培育高端理论研究人才、建立对外交往机制和平台的重要手段。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急于求成，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智库的各项管理制度。在资金层面，国家要给予智库建设更多的扶持，尤其应当针对社会智库设立特别基金或专项基金，让社会智库有资格、有途径去获取支持自身发展的资源。此外，还应在对外交往方面给社会智库创造更多条件。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因此，中国智库在国外设立分支的需求大大提高，高端智库应在国外设立代表处，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并加快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与落实。与此同时，在加强高端智库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用好离退休党政干部这一人力资源，发挥其社会余热，让他们参与智库活动，为智库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院长）

应从三维视角审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第一维是为党和政府提供智力支持；第二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第三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声音。

从宏观来说，智库建设有三个难题急需破解：其一，智库和智库载体职能区分的难题。例如，有智库责任的教学研究机构是智库发展的深层载体，但不能简单地把其全部责任都归于智库。其二，智库结构和功能定位的难题。我国智库大体上可分为四类：超官方智库，主要是人大和政协；

作为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研究机构，即官方智库；准官方智库，即具备党委和政府背景、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民办的非官方智库。应该形成在党的领导下，以高端智库为主体、多类智库共同发挥作用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其三，智库的研究方法和人才结构的难题。智库人才具有特殊性，这是由其特殊的研究方法所决定的，会做学术研究不等于会做对策研究，会做论证性研究不等于会做预测性研究。因此，各类智库要注重补齐短板，提高研究的前瞻性。

王国平（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

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明确八个要点：一是服务的理念，智库发展不能简单依靠行政管理手段和领导个人的行政权威，而应依靠智库自身来服务社会发展；二是服务的重点，智库应坚持问题导向，在擅长的研究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将专业化与职业化相结合；三是服务的对象，一流的智库不仅要服务领导还要服务社会，以客观理性的声音引领社会思潮；四是服务的特点，智库研究要具备超前性、系统性、专业性、示范性、操作性、时效性六大特征；五是服务的载体，智库要形成模块化研究和矩阵式管理模式，加强政策建议的及时性和针对性；六是服务的力量，智库要坚持以一流环境吸引一流人才、以一流人才创办一流智库，广泛凝聚各方力量；七是服务的资金，要探索长期稳定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同时支持社会力量捐助智库发展；八是服务的方法，要以主动出击为主，在积极抢占市场的同时作好谋篇布局。

王荣华（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我把高端智库的功能定位归纳为“5+1”。“5”是指五项功能：战略政策的储备库；社会大众的指南；庄严的学术殿堂；人才培养的蓄水池；国际交流的对话平台。“1”就是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新见解的头脑产业。高端智库应对的是快速变化、急遽转型、充满不确定风险的时代中的复杂

难题，应致力于研究新办法、寻找新方案、提出新规划、建立新规则。此外，高端智库要与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若即”就是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供决策层参考，“若离”并不是半心半意或三心二意，而是要求智库必须具有理论性，坚持独立思考、独立研究，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

周仲飞（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坚持教学、科研、咨询一体化建设，在决策咨询方面着重发挥如下作用：发挥教师在决策过程当中的主导作用，根据学院以专题研讨班为主的特点，教师组织研究性教学，开展现场教学和研讨，再将学习研究的成果概括整理、形成决策咨询报告；发挥学员在决策咨询中的重要作用，学员依托专题班次设立随机立项课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开展领导干部思想动态滚动调查，针对中央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和社会热点科学设计问卷，深入分析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发挥兼职教授在决策咨询过程当中的作用，与教师紧密互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先后创办了《领导参考》《研究咨询》，作为决策咨询研究平台，通过这两份内参将决策咨询成果上报中央。

李向军（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主任）

光明日报顺应时代潮流、呼应学界诉求，不但在智库报道方面走在前列，在理念上也不断深化，逐步确立了智库化传播的办报思路。

我们认为，媒体的智库化传播至少有三条路径。首先，把智库辅助决策、资政启民的价值取向作为基本理念贯穿全局工作，追求有调研、有分析、有深度的报道，培养有思想、有研判能力的智库型队伍。其次，做好智库成果的宣传报道，当好智库与政府、智库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桥梁与沟通纽带，帮助智库成果充分转化、释放能量。再次，发挥渠道优势，团结专家学者，建立自身的智库机构、策划组织选题，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光明日报正在沿着这样的路径不断探索，一方面，我们着力加强智库传播功能，2014 年 12 月，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热潮初起之时，光明日报推出《智库》版，创刊一年多来，《智库》版已经推出近 70 期，刊发一大批智库成果、研究文章、重要活动追踪报道。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出台、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启动、全国两会精神解读、“十三五”规划阐释等重要节点，《智库》版组织的报道都获得各界好评，撰写的智库建设典型案例系列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另一方面，陆续建立有光明特色的智库机构。2015 年 5 月，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正式成立，中心邀请和组织专家团队研究中外智库建设情况，发布中国智库研究成果，开展相关社会活动。今年 1 月，中心组织撰写的《2015 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发布，对一年来全国智库建设情况进行了梳理总结，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肯定，在智库界产生较大影响。目前，更加细化的报告正在《智库》版陆续刊登，计划近期出版，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参考。

燕爽（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建设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重点在于牢牢把握中央对智库的核心要求。首先是要正确认识智库的重要地位。在中央文件和总书记讲话中，都把智库作为提高干部专业素质、专业思维、专业能力的一部分，作为防风险、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的一部分。要充分认识这一定位。其次是要冷静认识智库发展实际。当前，智库发展迅速，但是基础还不扎实。新建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质量良莠不齐，一些不具备智库研究能力的所谓“智库”和真正的智库同时存在，鱼目混珠。还有一些地区，不管实际需求如何，盲目成立智库。再次是要充分认识中国智库的国情和特色，不能照搬西方的智库评价标准。中国的决策过程中，有许多机构在发挥智库的功能，例如政策研究室、学术研究机构、媒体内参等等。这些都应该纳入智库体系中去评价。在智库发展方面，我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功之处，否则中国不会在重大决策中保持正确的方向，不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更不会有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发展。因此，我们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体系和机制，把我国智库建设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

当然，我们也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改革和进一步发展。要在智库建设的供给侧、需求侧两侧发力。不仅要对智库本身提出要求，也应该对需求方进行改革。在对智库评价中，要明确智库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不仅仅是为党政部门服务，也可以为行业服务、为老百姓服务；智库的工作不仅仅是提供决策建言，也需要影响社会舆论、改善社会风气、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评价智库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同时也要注意对智库的劳动表示足够的尊重，与智库进行良性沟通，这样才能够鼓励智库的积极性、提升智库的研究成果质量。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学所所长）

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包括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协商民主、选举民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取向也应在这三方面有所体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主要体现在：敢于针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房价、股市等社会经济实践中的“重大疑难杂症”进行前瞻研究、复审研究、纠错研究，这是智库的主要功能，也是智库和行政部门的主要区别。行政部门是把定下来的事情做好，而智库则要善于在定下来的事中发现问题。智库的发展还有助于改变我们的干部体制，一个干部有没有发现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有没有战略思维，必须在智库里检验一下，经得起检验才能委以重任。

王辉耀（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智库面临着多重竞争下如何创新的复杂局面。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创新，我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智库可以把人才的“旋转门”旋转起来，让大量有经验的领导人进入智库，同时，智库人员也可以进入体制内担任领导职务，培养有跨界工作经验的智库领军人才，同时，还要从海外积极引进智库人才；二是要明确社会智库非盈利研究机构的法人地位，鼓励学

科基础雄厚的高校开办智库专业，鼓励大学生从事智库公益事业，鼓励国外智库学者到中国智库交流访问，鼓励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智库学习；三是进一步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智库联盟或者全球智库联盟。

柴俊勇（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

在决策中善用和用好各类智库，我认为要做到“五个善”：善始善终、知人善任、从善如流、实现善治、提出善策。目前，我们的党政干部在决策过程中遇到了“四个难”：对形势判断难、信息分析难、舆论应对难、本领提高难。党政干部的能力短板导致了本领恐慌，因此，要着力构建智库和决策部门交流合作、沟通联络机制，改变党委政府和智库之间“两张皮”的现象，将智库研究成果有效地纳入决策过程中，使研究方向切合决策的实际需求。（来源:《光明日报》）

首份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出炉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四成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4 月 7 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15 年在校生规模达 3700 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 2852 所，位居世界第二；毛入学率 4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预计到 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 50%以上，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报告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水平跃升世界中上水平，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分层分类培养多样化人才等方面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数据显示，2000 年至 2015 年的 16 年间，我国新建本科院校达 403 所，接近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的一半。此外，我国还有近 300 所独立学院。全国现有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括 4 个直辖市），新建本科院校分布于其中的 196 个城市，布点率达 57.82%。在非省会城市布点的新建本科院校有 208

所，占全部新建本科院校的 51.61%。新建院校成为承担偏远地区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也是基本解决人民群众“上大学难”问题的主力军。

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硬件”建设数量上井喷式增长，各级各类高校面貌焕然一新。与 2003 年相比，2013 年全国高校教育经费总收入增加 3.6 倍，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增加 4.9 倍，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支出增加 1.7 倍。从 2010 年到 2014 年年底，全国高校固定资产总值增加 42.15%，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增加 57%；全国高校专任教师数增加 2 倍多，且过半数专任教师具有研究生学位，4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到专任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二。

报告认为，从总体上看，进入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硬指标”成倍增长，“软实力”显著增强，我国高等教育正由“大国”向“强国”迈进，我国理应具有充分的高等教育自信。

同时，报告指出，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依然不少，主要表现为“四不够、一不高”：学科专业设置优化不够，科研水平和成果转化率不高，“短板”问题依然严重；创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仍是“软肋”；高水平教师和创新团队不够，教学经费和实践资源不足，实现由量到质的新跨越仍是突出问题；质量意识和质量文化不够，绩效评价不力，不少高校“等靠要”思想还相当严重，对教师评价“重科研轻教学”；就业与专业相关性不高，不同类型院校学生对学习过程体验和就业状况满意度存在不平衡现象，“级差”现象明显。

报告参考了 4000 多位评估认证专家的质量评估报告、700 多所高等学校质量报告、基于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的 40 多万个数据，并对 20 多万份专门调查问卷、数百人次深度访谈进行了系统分析整理统计。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摘要）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布的首份国家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报告以充分的教育自信和冷静的教育自省为主要基调，从“五个度”（即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培养目标的达成度、办学资源的支撑度、质量保障的有效度、学生和用户的满意度）进行多维评判，在国家数据库、评估认证报告和系列质量报告的基础上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力求用科学方法和国际视野客观全面评价中国高等教育质量。

从总体上看，进入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硬指标”成倍增长，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新阶段，“软实力”显著增强，呈现出良好的态势。

这些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变化，展示中国高等教育正由大国向强国大踏步迈进。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状况主要表现在：

1. 社会需求适应度

满足社会人才需要，适应经济转型发展，创新引领能力不足

中国高等教育体量世界最大，为社会各行各业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2014 年在校生规模 3559 万人位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 37.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为各行各业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有力提升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水平。

中国高等教育院校布局和学科专业结构得到改善，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匹配。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异军突起，中西部高校增量明显，高职院校占居“半壁江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趋于理性，与产业结构对接更加紧密，较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

中国高等教育科技实力不断增强，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日益

凸显。全国高校基础研究保持绝对优势，科技成果绝对量维持较高水平，系列科技创新平台大大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产生了一批代表国家水平的重大成果。在国家科技成果三大奖获奖数量、科技论文、科技专著等都占据了全国 70% 的份量，高校成为国家科研成果的“大户”。

高校一流人才培养和创新动力不足，对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和创新引领不够。从实施国家发展战略来看，高校“新四化”人才等一流人才培养不足，创新团队匮乏和创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学科专业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集成创新不多，重大项目联合攻关机制不畅。一流成果不多，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不高。高校内生动力和活力不足，对创新驱动发展支撑引领作用不够。

2. 培养目标达成度

高校分类培养多种多样人才，立德树人提升学生全面素质

各类高校开始理性定位、注重特色发展，形成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格局。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各高校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多样化人才的需要，因地制宜找准办学定位，各显其能特色发展，立足实地确定人才培养规格，各司其责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多样化人才，改变了以往高校办学同质化现象，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高校分类体系。

校企合作、行业协作等联合培养和协同育人的“组合拳”有突破、见成效。围绕“怎么去培养人”，国家高密度、大强度出台重大综合改革计划，推动高校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拔尖人才”和“卓越人才”等校企合作、行业协作的一套“组合拳”取得新进展，联合培养和协同育人初见成效。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仍是“软肋”，对人才培养的“短板”现象应有足够警觉。高校开始重视创新创业教育，但缺乏制度保障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社会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空间还比较有限，尚未形成长效机制，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招不多。全国高校各类毕业率和学位授

予率总体较高，在一些高校不同程度存在放松毕业要求、毕业生“用所非学”等“短板”现象，应引起各方面足够的警觉。

3. 质量保障有效度

多主体内外结合公共治理，多形式监测评估行之有效

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采取系列行政举措有效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高。政府通过加大经费投入、加强政策指导、不断完善制度和实施质量工程、设立重点项目等一系列措施，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切实保障了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充分体现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优势。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公共治理新格局。教育部顶层设计中国特色“五位一体”评估制度，充分发挥专业评估机构“第三方”作用，鼓励行业企业和社会广泛参与，建立“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内外结合”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制，初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

各类监测评估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内涵建设、特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实行分类评估、分类指导。合格评估兜住质量的“国家底线”，审核评估强调“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专业认证有行业企业广泛参与，国际评估鼓励与国际标准实质等效，促进高校自主办学、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发布质量报告，提高了质量监测评估的客观性和公信力。

国家高等教育资历框架和质量标准不健全，监测评估机构及资源亟待整合。国家高等教育资历（各级各类证书学历学位）框架还不健全，高等教育各类质量标准尚处建设之中，对高校办学绩效评价和参与国际监测评估项目不够重视。全国高职、本科、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保障与监测评估缺乏统筹协调和相互衔接，迫切需要整合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构及资源，并实行行业自律管理。

4. 办学资源支撑度

教育经费校园设施极大改善，师资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井喷式”增长，高校“硬件”建设面貌焕然一新。2013 年与 2003 年相比，全国高校教育经费总收入增加了 3.6 倍。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增加了近 5 倍；从 2010 年到 2014 年，全国高校固定资产总值增加了 42.15%，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增加了 57%，生均拨款水平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各类高校“硬件”建设投入呈现“井喷式”增长，从办学条件到校园环境，从教学资源到科研设施，高校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改善，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能满足教学科研需要，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高校师资队伍持续壮大，层次结构不断优化，青年教师发展潜力巨大。1999 年到 2014 年，全国普通高校教职工总数从 106.5 万人增加到 233.6 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专任教师从 42.6 万人增加到 153.5 万人（净增 110.9 万）。专任教师中 50%具有硕博士学位，青年教师（45 岁以下）超过 70%，全国整体教师队伍发展潜力大、后劲足。

全国高校生均经费仍然不足，生师比居高不下，大师级领军人才比较匮乏。不同类型高校生均拨款存在差距，不少新建本科院校尚未达到国家标准（12000 元/生）。高校普遍存在教学经费不足，实验、实践教学设施相对紧缺，并且从高校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总经费比例来看，近两年高校教育经费比例略有下降。全国高校生师比偏高，初中级职称教师约占 80%比例，高校中大师级领军人才和学科带头人比较匮乏。

5. 学生及用户满意度

全面关心关怀学生成长成才，学生及用户满意度持续提升

学生对学校满意度“硬件”超过“软件”、师资素质超过教学质量。各类高校通过加大人员、资源等方面的投入和制度保障，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整体提升幅度较大，学生对在校学习、生活体验的满意度逐步提高。

总体上看，学生对学校“硬件”的满意度超过对“软件”的满意度，对师资队伍的满意度超过对教学质量的满意度。

高校注重“以学生发展为本”，全面关心关怀学生的成长成才。高校努力关心关怀学生和强化学生就业工作，学生对学习过程体验和就业状况总体上比较满意，但不同类型院校存在不平衡现象。在“985 高校”和“211 高校”，学生对于教师学术水平的认可度明显高于教学水平的认可度；而单纯从教学质量的认可度而言，“211 高校”和“985 高校”反而不如一般院校。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学生创新创业总体比例较小。不同高校就业率不平衡，“985 高校”“211 高校”在毕业生就业率方面优于一般普通本科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比例较小，综合素质培养仍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有待提高。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基本认可，不同类型高校存在较大差别。业界对毕业生知识、能力和素质比较认可，但高校教学与社会实际也在不同程度存在脱节，毕业生所学专业与就业岗位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需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和提升创业实践能力，重视发挥用人单位的评价结果对高校专业调整、人才培养改革等方面的作用。

6. 放眼全球看质量

与国际质量保障主流比肩而行，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之路

中国要建设成高等教育强国，亟待以开放促改革、提质量。前 30 年，中国能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得益于改革开放；后 30 年，中国要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制胜法宝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提质量，是做大做强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必然路径，必须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扎扎实实把提高质量举措落到实处。

注重质量是高等教育时代命题，谁轻视质量谁将被淘汰出局。1998 年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向全球昭告，21 世纪将是更加注重质量的世纪，谁轻视质量谁就将被淘汰出局。“质量的实现既要求建立各种质量保障体系，

形成多种评价模式，同时更需要在机构内部形成一种质量文化。”这是时代命题，也是历史使命。

国际三大新理念指引方向，与世界比肩迫切需要“三重”转变。“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教育”和“培育质量文化”，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竭力推行的三大先进理念。中国走高等教育强国之路，质量保障迫切需要实现关注重心由“教师”到“学生”、评价重点由“投入”到“产出”、建设重任由“方法技术”到“质量文化”的“三重”转变，并切实加以落实、落地和落细。

国际两大新举措“外推内引”，中国标准中国模式渐领风骚。国际组织推行“国际实质等效”质量标准和“高校优秀实践”示范引领，内外结合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中国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有国际“尺度”参照，但不是被动接受国际评估。中国特色的“五个度”质量标准和中国大学的“内部质量保障优秀实践模式”得到国际上高度认可，要从战略上大力宣传推广，尽快掌握国际教育质量标准和评估规则的话语权，在国际竞争中尽快实现从跟随者向领跑者的转变。

国际两大新方法开创监测评估新时代，中国首创“数据平台”广受瞩目。周期性评估和基于大数据常态监测的有机结合，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的一种全新模式和潮流。中国建立起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数据平台”，并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向社会公开发布各类质量报告，这在国际上是一个创举，得到国内外各方的高度评价。

中国质量需要充分自信与冷静自省，以开放和创新加快强国建设步伐。中国高等教育要实现由大到强，必须增强高等教育质量的充分自信和冷静自省，并把提高质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必须以开放促改革、提质量，用“国际实质等效”标准助推中国质量提升；必须全面提升高校创新能力，真正支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实现“跨越发展”和“弯道超车”。（来源:《中国教育报》）

【专家视点】

高校建设“两个一流”应注重四个坚持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曹国永）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继“985”“211”工程之后，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出的又一重大举措，对高校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进程中，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应积极行动起来，从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发展资源的维度进行认真思考与顶层设计，突出办学特色，强化现有优势，对接国家战略，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创一流。

坚持发展定位差异化，做好“两个一流”建设规划。长期以来，高校发展定位的趋同令人诟病。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目标要求，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要求更趋多元化，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和学科也应多样化。世界一流大学既不局限于综合性大学，也不受制于学校规模，能够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作出一流贡献的大学，都有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就要求高校必须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传承学校自身的历史文化，强化办学特色，避免千校一面，规划好学校“两个一流”建设的路线图与时间表，积极探索符合国情、校情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

坚持发展目标科学化，把握“两个一流”建设方向。一流的学生是一流大学的根本特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将立德树人放在首位，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高校应当科学合理地确定“两个一流”建设的目标，坚决避免重科研轻教学，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将一流人才的培养作为“两个一流”建设的重中之重，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强科教融合、产学融合，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同时，还应把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的全过程，注重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激励学生成长成才。

坚持发展路径特色化，选准“两个一流”建设突破口。建设一流大学必须以一流学科为基础。当前高校普遍存在学科建设资源分散，学科特色凝练不足，学科重点突出不够等问题，制约了学科建设水平的提升。高校应当发挥学科建设的龙头作用，进一步凝练学科特色，进一步汇聚优秀人才，将学科建设的重点确定为适合国家战略需求、具备良好发展基础、能够体现办学特色的学科，坚决避免平均用力，集中力量建设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学科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流学科，使部分优势特色学科率先冲击世界一流水平，进而带动学校整体步入世界一流行列。

坚持发展资源多样化，确保“两个一流”建设保障有力。长期以来，高校的发展模式相对封闭、资源渠道相对单一。现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建设“两个一流”需要较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基础上，一方面高校应当加快开放办学步伐，不断拓展开放办学的广度和深度，依托学科的优势与特色，促进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互动，推进与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积极争取和吸引社会支持，不断拓展多元化筹资渠道，多方面汇聚资源，为“两个一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另一方面，高校要深入推进综合改革，激发办学活力，通过健全学科绩效评价机制和开展学科自评估等措施，不断淘汰对社会贡献不大、发展潜力不足的学科，进一步提升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效益。（来源:《人民日报》）

如何优化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黄海军，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李立国）

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布局。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和国家创新体系的生力军，优化研究生教育学科结

构是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布局的重要方面。新世纪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研究生教育大国。2014 年，我国研究生学位授予人数 66.6 万人，其中博士 5.7 万人，硕士 60.9 万人，比 2000 年增长近 5 倍。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优化结构的任务日益突出。

优化学科结构是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的重要切入点

学科结构是研究生教育结构的重要组成，相比于层次结构、类型结构，我国学科结构的优化还相对滞后，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还存在差距。

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变化呈现“形有所变、实则未变”的特点。形有所变，是指各学科门类增速快慢不一、所占比例此消彼长。具体表现为：一是学科大类中“一升两降，此消彼长”。人文学科所占比例上升，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占比例下降。2000 年至 2014 年，我国授予研究生学位中，人文学科由 0.64 万人增长至 4.73 万人，所占比例由 9.8%上升至 12.3%，上升了 2.5%；社会科学由 1.70 万人增长至 9.53 万人，所占比例由 25.7%下降至 24.9%，下降了 0.8%；自然科学由 4.27 万人增长至 24.08 万人，所占比例由 64.5%下降至 62.8%，下降了 1.7%。二是学科门类中“快多慢少，增速不均”。法学、教育学、文学等学科门类的增速远高于平均增速，而工学、医学的增速则低于平均增速。三是工学占比有所下降。仅从学术研究生数据看，工学的比重有了一定幅度下降，由 2000 年的 37.9%下降至 2014 年的 35.0%，但如果考虑到近些年来专业学位中工程硕士快速增长的因素，那么整个工程类硕士所占的比重变化并未如此之大。

实则未变，是指学科结构的结构性变化不明显，呈现出“存量决定增量”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某个学科门类在校生数占全国在校生总数比例越高（即存量越大），那么该学科在扩招过程中的增幅也将越大（即增量越大）。即注重数量的扩张，而忽视了结构的调整。一些学科增长较快，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办学成本相对较低而容易扩张，而工学、医学等学科因为

受硬件条件约束更大，跟不上整体的规模扩张。从近年来我国就业市场来看，新闻、法律等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与其增长过快存在密切关系。

优化学科结构需把握解决的几个关系

一是文与理的关系，即人文社科与理工科的比例关系。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或中后期，理工科依然应该是我国大力发展的学科专业。2014 年我国理工科所占比例为 48.0%，占据半壁江山，应继续保持这一优势。据 OECD 统计，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专业授予的研究生学位所占比例，2011 年经合组织平均值为 23.4%，德国为 34.8%，日本为 46.6%，法国为 28.0%，英国为 21.9%，美国为 13.3%。德国经济能在欧洲一枝独秀，与其重视 STEM 学科，具有合理的学科结构不无关系。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重新认识到工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实施了再工业化战略，加大了对 STEM 的支持力度。

二是软与硬的关系，即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比例关系。一流的基础研究是高技术转化的必要前提。我国许多应用研究和核心技术突破不了，根子还在基础研究薄弱上。一流的基础研究需要依托于一流的基础学科。博士教育重基础学科，硕士教育重应用学科，这是研究生学科结构的特点。近年来，我国的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的学科门类结构不仅没有向差异化方向发展，而且趋同性有所加强，没有体现出博士和硕士人才培养的不同目标要求。具体而言，在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在保证基础性、理论性学科专业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应该大力发展应用型学科专业，培养高层次应用性人才；博士生教育应以培养学术性人才为主，重视理论性、基础性学科的人才培养。

三是高与低的关系，即处理好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关系。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博士研究生教育是不同性质的教育，它们的学科分布差异较大，各国也由于发展阶段与特点不同，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英

美国家普遍授予理工农医博士数量高于文科，而授予文科硕士数量高于理工农医。英国 2011 年授予理工农医博士 1.3 万人，文科博士 0.7 万人；授予理工农医硕士 5.6 万人，文科硕士 10.6 万人。美国 2013 年授予理工农医博士 10.1 万人，文科博士 7.5 万人，理工农医博士人数高于文科；授予理工农医硕士 30.7 万人，文科硕士 44.5 万人，文科硕士人数高于理工农医。日本无论授予博士人数还是授予硕士人数，都是理工农医远高于文科，2011 年授予理工农医博士 1.1 万人，文科博士 0.3 万人；授予理工农医硕士 4 万人，文科硕士 2 万人。我国也要根据国情和研究生教育发展阶段，科学规划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关系。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根据办学条件，同时考虑社会需求来布局发展，而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根据社会需求，同时考虑高校办学条件来布局发展。

四是新与旧的关系，即传统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的比例关系。20 世纪以来，知识结构不断变化，传统知识被新兴知识取代或补充。交叉学科是学科知识高度分化和融合的体现。最近 25 年，交叉性的合作研究获得诺贝尔奖项的比例已接近 50%。新旧知识的不断演化，反映到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上，就是有些学科取得快速发展，而另一些学科逐渐被弱化。美国的学位统计划分为 7 大研究领域，除了传统的 6 个领域之外，2013 年归为“其他领域”的博士学位比例高达 66.0%，硕士学位比例为 25.7%，这反映了美国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情况。相比而言，我国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发展还较为薄弱，在学科设置和统计上都存在制度障碍。

优化学科结构的政策建议

学科结构优化要遵循教育规律，从社会需求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现实出发，逐步调整优化。核心还是处理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政府以放权、质量保障、标准确定等方式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整学科结构。

在政府主导与授权，地方、高校竞争式发展的模式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进行指标分配，比如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增加，

每个省只能报两所高校两个专业，指令性分配的结果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平衡发展，但也导致了研究生教育增长“一刀切”，各类高校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也导致了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同质化倾向。各地方和高校带着“不报白不报”的心理尽可能地去扩大增量，力求将自身诉求得以最大化，出现了为争取授权点而争取，为扩招研究生而扩大规模的问题，罔顾结构调整与自身办学条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制约与限制，使得研究生教育难以在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的情况下进行规模扩张，双方博弈的结局是各地、各高校一起扩大规模。改革的关键是形成“需求和条件相结合”的刚性约束机制，使得研究生人才培养能够在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的双重约束下发展，既要考虑办学质量，同时考虑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为此，建议如下：

一是以服务需求为导向，完善学位点动态调整机制。教育部门应坚持放好权、服好务，完善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实行培养单位自评与抽评相结合的评估方式，适时引入国际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对社会需求少、培养质量差、就业率低的学位点，及时进行整改或撤销。

二是建立准入退出机制，增强学科专业目录的灵活性。目前，我国实施这一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基本成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所实施的三轮学科评估均具有良好的社会反响。可考虑以此为契机，将每一轮学科评估作为学科、专业目录设置和调整的基本依据，实现学科专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将大大有利于增强学科设置的灵活性。

三是为交叉学科“上户口”，破除开设交叉学科的制度障碍。应赋予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同等地位，可考虑在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交叉学科门类”，学科门类下设交叉学科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以问题或领域为导向灵活设置，开展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活动，定期接受评估，实现动态调整。

四是实行分类管理，不同高校培养任务各有侧重。政府要充分授权，进行总量控制，至于培养的结构，可以由高校根据学生就业、社会需求、

学科发展、师资队伍等情况自行决定，实行备案制。不同类型高校应该承担不同的培养责任，如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不同学校应有所侧重，没有必要规定统一的比例要求。

五是给予学生选择权，高校探索双硕士学位的制度创新。高校要实行人才培养方式制度创新，如可试行硕士专业学位的第二学位制度，给予学生选择自主权，既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也有利于高校发挥不同学科的协调作用，逐步实现学科调整优化。（来源:《光明日报》）

【校内传真】

我校召开2016年教学工作会议暨“教学质量年”动员大会

4月5日，我校召开2016年教学工作会议暨“教学质量年”动员大会，研究部署学校本科及研究生教学工作，并对“教学质量年”活动进行动员部署。会议分别由校党委书记关一凡、副校长徐西鹏主持。复旦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徐雷教授、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陶涛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副校长徐西鹏、吴季怀等分别作主题报告，校长贾益民作总结讲话。土木工程学院、文学院、旅游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代表先后发言，介绍各自在专业评估、精品视频公开课的建设与申报、实验教学、研究生培养方面的经验。

据了解，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开展“教学质量年”活动，我校将启动本科专业培养方案2016年（版）修订工作，持续开展学风建设系列活动，并实施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等。（华大新闻网）

我校召开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项目中期检查学术交流会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

目（2013 年度）中期检查学术交流会议在我校王源兴国际会议中心 202 室召开。此次会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华侨大学承办。会上，我校副校长徐西鹏教授，以及来自厦门大学、福州大学、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湖南大学等 6 位重点项目负责人分别汇报了项目启动以来取得的成果、进展和今后的工作思路。与会专家围绕课题组汇报、质疑讨论等关键科学问题进行交流和研讨。

据了解，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于 2011 年 12 月共同设立，面向全国，公平竞争。该项目旨在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引导社会科技资源投入基础研究，进一步吸引和聚集海峡两岸科学家开展科技合作，重点解决福建及台湾地区共同关心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带动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海峡两岸经济区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华大新闻网）

本期送：校领导，纪委，党委各部（室），工会、团委，各学院、处（室）、直属单位。

网址：http：//fzghc.hqu.edu.cn/　　邮箱：hqdxfzghc@163.com

内部资料　妥善保存　　**责任编辑：吴晗冰　张丽萍**